

“灰色地带”中的挣扎——“孤岛”与沦陷时期（1937—1945）上海文化人的行为分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葛涛

【摘要】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上海文化人的行为，在根本上是由其所身处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所谓特殊的环境，实则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上海近代以来相对自由、西化的文化氛围与日伪统治当局试图用高压手段管制文化生活，以确保其内容符合当局政治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文化人的理想与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对于日伪统治时期仍然滞留上海的文化人，除了少数政治立场极为鲜明者（如公开投靠日伪以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庆、中共潜伏者）之外，大多数人的行为轨迹，无法摆脱特殊环境的制约。因此，在分析孤岛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的行为之际，仍应将出于生存及职业的需求置于首位予以考虑。这一需求，既与当时上海社会其他阶层的情况具有共通之处；进而言之，也是贯穿近代上海历史之中，职业人士所必需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就此而言，战时上海进行公开活动的文化人，绝大多数可谓处于“灰色地带”状态，绝非“抵抗或者合作”这样的二分法可简单加以形容。由于在民国成立以后，上海社会已逐渐具备了近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态，中产阶级文化、大众消费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主流，文化的传播与社会影响力不同寻常。较之其他社会职业人士，文化人的行为显然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这也是其行为的特殊性所在。

【关键词】灰色地带 战时上海 文化人

中日全面战争时期的上海文化界，呈现出一种近代以来所罕见的异样景观。一方面，日本占领当局与傀儡政权出于维护、扩大其统治的政治需求，力求改造上海文化界，造就符合其要求的文化内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伪当局对上海文化人进行了积极的争取。除了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予以拉拢或胁迫，还试图从意识形态方面施加影响，争取获得认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孤岛”终结，上海进入了全面沦陷时期。随着日伪当局对社会进一步加强控制，文化人的自由创作空间更加遭受挤压。但是正如日伪统治时期上海社会仍然维持运转一般，文化界的活动并未停止。那么，究竟应以何种视角看待这一时期仍维持公开活动的上海文化人呢？是否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必然属于“文化汉奸”或有亏于民族气节呢？

一、“孤岛”时期的生计

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来，上海的文化事业以及文化人的境遇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既有文化机构之中，有相当数量难以为继。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上海的一些重要文化机构响应国府号召，向尚未沦陷的内地及香港转移。如1925年创立的天一影片公司即于1937年春结束在沪业务活动，迁至香港。一些文化机构在战火中遭受破坏，或因战事而无法维持正常业务。如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在“八一三”爆发后不久，即因部分厂房、设备遭到战火毁坏而被迫停业。

而淞沪抗战结束，国民政府撤离上海后，日伪当局开始对滞留的文化机构实行了严厉的管制措施。如日本军方着手整顿上海的无线广播电台，以重新登记为名，强行关闭了多家电台。又如 1937 年 12 月，日军占据上海新闻检查所，随即命令各报送交报纸小样以待检查。至 12 月底，已有三十余种出版物停刊，四家通讯社关闭，其中包括《申报》与《大公报》。而在日军实施新闻检查之前，上海已有若干报社或因内迁、或因战事业已停业。¹

晚清以降，上海渐成中国新文化的中枢之地。上海拥有建立于市场机制之上、依托商业模式运营的成熟、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全国各地的文化人提供了谋生的工具，以及施展抱负的舞台。近代上海的文化人群体，是文化市场的被雇佣者，文化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构成他们生活、事业的社会基础，与近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具有根本性差异，这就导致了近代上海文化人群体行为的市场化、商业化属性。上海沦为“孤岛”之初，既有的文化产业在震荡之余，使依附于此的文化人群体的生存基础受到了沉重打击，大量人员失业。对于滞留沪上的文化人而言，如何维持、恢复生计，是“孤岛”初期面对的首要问题。

然而进入 1938 年之后，不少文化人的生计已出现起色，生存问题变得不再刻不容缓了。一些人似乎正在恢复战前的日常行为模式与生活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许多人的求职行为获得成功，重新回到了文化机构。而文化机构的重开、新开，则为文化人的求职行为提供了支撑。以 1940 年上海地区正常运营的报纸为例，其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上海报纸情况表（正常运营）
（1940 年）

名称	使用文字	国籍	形式
大陆新报	日文	日本	日报
上海每日新闻	日文	日本	日报
新申报	中文	日本	日报
申报	中文	美国	日报
新闻报	中文	美国	日报
华报	中文	美国	日报
大美周报	中文	美国	周报
新闻夜报	中文	美国	晚报
大晚报	中文	英国	晚报
大英夜报	中文	英国	晚报
大美晚报	中文	美国	晚报
华美晚报	中文	美国	晚报
中华日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东方日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小型
力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锡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社会日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¹ 熊月之主编、许敏著《上海通史》第 10 卷“民国文化”，第 52、5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生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迅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新浦东	中文	中国	日报
宁波日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好 莱 坞 日 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奋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小型
桃 色 新 闻 报	中文	中国	日报
教育界	中文	中国	日报
字 林 西 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英文	英国	日报
上 海 泰 晤 士报 Shanghai Times	英文	英国	日报
大陆报 China Press	英文	英国	日报
大美晚报 Shanghai Evening Post	英文	美国	晚报
Evening Echo?	英文	英国	晚报
上海日报 Journal de shanghai	法文	法国	日报
德 文 新 闻 报 Ostasiati scher Iloyd	德文	德国	日报
上 海 犹 太 人纪事报 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	德文	犹太	日报
上 海 柴 拉 早报 Shanghai Zaria	俄文	白俄	日报

上海俄文 日报 Slovo	俄文	白俄	日报
Shanghai Wotzhe?	德文	犹太	周报

（根据『大陸年鑑 昭和 15 年版（民国 29 年版）』、大陸新報社編、四三ページ「上海新聞一覽表」翻译、整理，另参考了《上海通志》第四十一卷《报业、通讯、出版、广播、电视》第一章“报业、通讯”第二节“外文报纸”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4598/node79769/node79780/userobject1ai104418.html>）

从上述情况可知：1940 年上海维持正常运作的报纸数量超过了“八一三”之前。这种情况主要得益于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繁荣。除了报纸，其他出版物，如图书、杂志等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孤岛”效应之下，可供上海文化人就职的机构为数众多，其生计问题得以缓解，为日常生活所困的情况有所减轻。

二、“灰色地带”中的文化人

作为社会阶层、职业群体，文化人的工作、生活与其精神追求、思维方式紧密相关。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上海文化人的艺术追求、思想观点、生活态度等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上述种种，均体现于其作品以及日常行为之中。民国以来，中国文化人的政治倾向性逐渐鲜明，参与政治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这一方面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政治分裂、民族危机深重的状况直接相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实行“训政”，明目张胆地推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上海因租界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缓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化人得以在上海集聚，文化人之间的左、右之争也表现得较为激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上海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重镇，文化人则是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截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上海文化人中的政治性行为就颇为引人注目了。

“孤岛”时期，上海文化人中的政治分化表现突出。在对待日伪的问题上，就分为投靠与抵制两者截然相反的立场。此外，更多的人则是处于投靠与抵制之间、政治色彩暧昧的“灰色地带”。“孤岛”时期上海政治、社会环境之复杂，显然超越了战前。有的文化人在这种情况下，其政治行为可谓令人目眩；也有的则深藏不露，其真面目并不为世人所明了。以袁殊为例。袁殊 1911 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幼年随亲到上海，12 岁即进入印刷厂做学徒工，后入上海立达学园免费就读。北伐军兴，他投笔从戎；1927 年国民党“清共”后，他离开北伐军，回沪从事文艺创作。此后，他赴日攻读新闻学，其间通过阅读日共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主张。30 年代初回上海后，创办《文艺新闻》，与左翼人士过从甚密。1931 年 12 月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当局秘密处决后，上海各报刊均保持沉默。而袁殊则受冯雪峰之请，分数期在《文艺新闻》揭露了这一情况。1931 年 10 月，潘汉年发展袁殊成为中共党员，

参加中央特科，设法获取国民党的情报。为了隐蔽自己，他有意地褪去左倾色彩，以一介“灰色小市民”的面目示人。同时，袁殊将《文艺新闻》停刊，并改名“袁逍逸”。出于获取国民党方面情报的初衷，他进入了国民党中统，成为其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长。由于袁殊懂日语，所以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也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建立了私交，岩井有意发展其成为日本情报员，经请示中统同意后，袁殊与岩井建立了工作关系。1935年，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袁殊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被列籍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不久即因此受牵连，在“怪西人案”中被军统逮捕，所幸身份未暴露。短期关押后再度以留学名义避往日本。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被视为亲日派而受到日本拉拢，而军统也有意请袁殊为其工作。在潘汉年同意的情况下，袁殊被戴笠委以国军少将之衔，任军统上海地区国际情报组组长。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同时继续与岩井英一过从甚密。1938年，袁殊受军统之命，准备用爆炸的方式除掉伪政权的特务机构“76号”及其首脑李士群，但因事泄被捕。在岩井英一的干预下获释后，遂应其要求，积极投入所谓“兴亚建国”运动，然而这又分别得到了潘汉年、戴笠的认可。所谓“兴亚建国”运动，是鼓吹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全面合作、充当其傀儡的汉奸活动，从其系列口号即可见一斑：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结为兄弟！中国青年与日本青年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与建设东亚新秩序是不可分的！中日彻底提携合作，是兴亚建国的唯一途径！抵抗西欧帝国主义之侵略，实现东亚民族之解放！扑灭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国际之赤化阴谋！从反共和平中建立新国家，复兴中华民族之精神！与日本协力开发资源，以求中国国货之发展！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求中国生产力之扩张！实施新社会政策，以求民众生活之向上！建国兴亚，努力世界和平！建国兴亚，创造人类新文化！²

所谓“兴亚建国运动”的重点，是在文化方面，岩井英一为此对袁殊寄予了厚望。此时，袁殊再度易名为“严军光”，发表了《兴亚建国论》一文。岩井英一与严军光是主持“兴亚建国运动”实际工作的两个主要人物。岩井任该运动的总顾问，严军光则为“主干”。他们安排了该运动主要骨干分子于1939年11月27日至12月7日的访日活动。一行由日本外务省负责接待，受到了内阁总理大臣阿部信行、前总理近卫文磨等日本政要的接见。1940年3月初，严军光、岩井英一在东京与日本前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等举行座谈，主题为“东洋思想，日本思想之真髓”，试图从中日同文同种的角度出发，鼓吹中日联手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共同驱逐白种人势力云云。白鸟敏夫在谈话中竟斥责甘地与泰戈尔“都是英国人的狗”，原因在于对英国的态度还不够决绝。³

“兴亚建国运动”举办了“大征文”活动，分为论文、文艺两部分。共征集到稿件3793件，其中属于“文艺”的有1386件，包括“创作小说”639件，“舞台剧本”450件，“电影剧本”297件。此外，还有论文862件，歌词1545件。上述稿件的发稿地中，日伪统治区域占91%，非沦陷区及海外占9%；华北沦陷区占41%，华中沦陷区占35%，华南沦陷区占15%。稿件由中日双方组成的评审机构进行遴选，入选者发表于《兴建月刊》及日伪控制的沦陷区各主要报纸上。1940年，日本学者加田哲二致函严军光，呼吁召开“中日文化人会议”。严军光在复函中，首先对于著《兴亚建国论》的目的进行了说明：对于“中国抗日作战之实情”、“中国国家之地位”、“东亚全体之环境”、“中日关系之根本”

² 《兴亚第一年》第10页“我们的口号”，兴亚建国运动本部1940年版。

³ 《兴亚第一年》第142页“严军光·白鸟敏夫会谈纪录”。

等等，“作一要约的再检讨与再认识而已”。对于提议本身，严军光表示赞同，并应允设法促成。

由于袁殊的“业绩”，他在汪伪政权中地位显赫，任伪上海市教育厅长、市政府参议等。与此同时，他与军统、中共均维持着关系，接受其指令。1945年抗战胜利，军统立即授予他中将军衔，并命令他克日面见戴笠，接受指示。然而他却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解放区，改名为“曾达斋”，于1946年初重新加入中共。国民党获悉真相后，始以“汉奸”罪名对其进行通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达斋”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虽然袁殊易名改姓，成为了中共干部，但由于他昔日在文化界、尤其是汪伪时期在上海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许多人文化人并未忘记他，视其为丧失气节的人物。1955年潘汉年被逮捕后，袁殊也被长期关押。1982年随着潘汉年被平反，他也获得了平反，并被恢复了中共党籍。在本人的要求下，他的姓名又从“曾达斋”改回了“袁殊”。⁴

袁殊的经历并非个案，关露的情况也极其类似，结局似乎较之袁殊更为悲惨。关露于30年代初即已成为闻名上海的女诗人，上海沦陷后仍活跃于文坛，与李士群等关系密切。关露因参加1943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成为公开的汉奸，会议代表六百余名，关露即为其中之一，与东条英机、林柏生等共聚一堂、谈笑风生。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其列为汉奸。但实际上，关露于1932年即加入中共，上海沦陷后奉党组织之命打入敌伪内部，搜集情报。袁殊、关露在1949年之后，因“汉奸”的罪名而被捕多年，直至人生暮年才得以平反。上海“孤岛”及沦陷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文化人在政治波澜中的惊险，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有的文化人虽然与日伪当局有牵连，但是却并未被认作汉奸，如陈柱。陈柱作为史学界、国学家，20年代起任教于上海大夏、暨南、光华、交通等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度居于租界。后往南京，任文物委员会兼博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中央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等职。其间，日伪当局为了粉饰太平、为所谓“日支提携”造势，曾于1941年中在南京香铺营的中日文化协会建国堂举办了“中日文化资料展览会”。根据米田祐太郎的描述，陈柱在这次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他向展会提供了自己的藏书：陈柱为当代支那学泰斗，因家学渊源，故藏书丰富。其收藏书籍的爽籁馆令学者们艳羡、赞赏不已，大有令人叹为观止之感。由爽籁馆提供的陈列实乃本次展览会的骄傲。⁶陈柱于1944年春因病辞职回沪，同年逝世。抗战胜利后，陈柱与日伪的关系并未被深究，被解释为遭受挟持之下的举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据了公共租界，结束了“孤岛”状态，上海进入了全面沦陷时期。日本为了动员所有力量进行“大东亚战争”，开始对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企图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日本与西方殖民帝国之间的争夺掩盖为日本对西方列强发动的“圣战”，日本是引领亚洲各国人民摆脱西方殖民奴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斗士，亚洲各国的领袖。日本在中日全面战争之初，即已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此时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的思想控制，煽动对“鬼畜美英”的仇恨情绪。在中国沦陷区内，日本表示要建立所谓“日华新关系”，然而其实质在于继续强化对傀儡政权及沦陷区的控制。

⁴ 参照“五重间谍——历史上真实的‘伪装者’袁殊”，“上海党史”网 <http://gov.eastday.com/node2/shds/n218/n221/u1ai16242.html>；《我的父亲袁殊》，曾龙编著，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

⁵ 「大東亞文学者大会」、『大東亞共榮圈写真大観』、鉄道工学会昭和18年。

⁶ 翻译自「日華文化展覧会」、『支那一夕話』、米田祐太郎著、教材社昭和17年。

为此，日伪更为重视文化宣传政策，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东亚战争”之下沦陷区人民的精神状态。1943年6月初，汪伪政权公布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其基本方针为：一面促进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一面力谋中国文化之重建与发展、及东亚文化之融合与创造，进而贡献于新秩序之世界文化。⁷

上海全面沦陷的现实，对文化人的生存状态构成了重大挑战，迫使他们的行为模式再次发生改变。原本投靠、依赖日伪的人士与当局走得更近；抵制日伪的人士处境更为艰难，几无存身之所。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文化人出于现实生存的考虑，不可能走隐遁之路。大多数人在维持公开的社会活动，以及履行职业行为之时，尽可能在政治上保持“灰色”，呈暧昧不明之态。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复杂、多面的，即使是在如此环境下，一些文化人还是看到了机会。以流行歌曲为例。近代中国流行歌曲的源头可上溯至清末学堂歌，1927年在都市歌舞曲的烘托下，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在上海诞生。30年代初，流行歌曲被冠以“时代曲”之名，大多以国语有声电影主题曲、插曲的方式流行起来。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唱片业以及无线电广播业中心的地位，为“时代曲”的流行增添了极大的助力。然而在“孤岛”终结之前，国语流行歌曲受到爵士等英美流行音乐的挤压，发展势头有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方面英美流行音乐遭到禁止，一方面日伪又在所谓发扬东亚文化的框架内“重建中国文化”，这就在客观上为国语流行歌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国产电影领域。以30年代中期即已闻名全国的影星、歌手周璇为例。她在上海全面沦陷后曾一度息影，也不再灌唱片，但是并未离开上海，而是在等待复出的合适时机。1943年5月，在上海日伪当局的一手操纵、扶持下，具有垄断性质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成立，由张善琨任总经理。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张善琨成功地说服周璇允诺加盟“华影”，重回影坛，从而也为重返歌坛铺平了道路。周璇于1943、1944、1945相继在“华影”拍摄了《渔家女》、《鸾凤和鸣》、《红楼梦》、《凤凰于飞》等4部影片，上述影片中均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插曲。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明确得出的结论是：《渔家女》的插曲“渔家女”、“疯狂的世界”由胜利公司录制成唱片；《红楼梦》的插曲“葬花”，以及《凤凰于飞》的插曲“凤凰于飞”、“慈母心”则由百代公司录制为唱片。而《渔家女》中的另一首插曲“交换”，《鸾凤和鸣》的插曲“不变的心”、“真善美”、“讨厌的早晨”、“可爱的早晨”，以及《红楼梦》中的另一首插曲“悲秋”的情况则不甚明朗。

与以往相比，周璇此时录制唱片的业绩不佳，这与她坚持回避亲日歌曲的原则有关。这时期上海最夺目的歌坛新秀非李香兰莫属，她也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李香兰演唱的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如《恨不相逢未嫁时》、《卖糖歌》、《夜来香》等均于此时录制，除了在沦陷区、伪满洲国、日本广为流行之外，在国统区也有大量听众。全面沦陷时期的百代群星中，除了周璇、李香兰外，比较著名的还包括白虹、姚莉、白光、吴莺音、龚秋霞、李丽华、陈燕燕、陈云裳等。黎锦光、陈歌辛等成为这一时期百代流行歌曲的主要作曲者，陈蝶衣、李隽青等则是主要的词作者。⁸

“华影”在1945年后陷入困境，张善琨也因被怀疑与重庆方面有联系，而一度被日本军方关押。上海光复后，国民党当局虽未追究张善琨在沦陷时期的行为，但舆论却要求将其以“汉奸”论处，张善琨遂避居香港。由此可见他在

⁷ 《申报》（一）社评“如何实施文化宣传政策纲要”，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一。

⁸ 葛涛著《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第27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战时与重庆方面确有关联。陈歌辛在战时上海的命运跌宕起伏，全面沦陷后表现活跃，进入“华影”音乐部，创作了一些国语经典流行歌曲，其中不乏具有亲日内容的作品。1946年，陈歌辛避居香港，1950年回到上海，在昆仑电影制片厂任作曲。1957年被划为“右派”，发配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后死于该地。1979年获平反。黎锦光于1944年创作了《夜来香》，由李香兰首唱后迅速流行，可谓脍炙人口。抗战胜利后，李香兰被国民政府遣送回日本，黎锦光则继续在百代公司音乐部任作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中国唱片厂任职，不再创作歌曲。80年代后重新活跃。

也有人在“孤岛”及沦陷时期确实做到了淡然处世，独善其身。如油画家关紫兰。她虽然具有留日经历，但却淡出画坛及社交界，在平静的氛围中度过了这一时期。在此后的岁月中，关紫兰依然生活平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艺术创作，直至1985年逝世。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灰色地带”原本是指称事物的中间领域、“无法区分黑白”的暧昧领域的日常用语。对于战时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使用“灰色地带”进行表述，则是受到了美国学者傅葆石（Poshek Fu）与日本学者古厩忠夫的影响。傅葆石是在战时上海知识分子研究中，提出“灰色地带”（grey zone）的第一人，古厩忠夫则扩展了“灰色地带”的内涵。傅葆石明确指出：在战时上海，知识分子除了抵抗（resistance）与合作（collaboration）之外，还有人选择了顺从与隐遁（passivity）。古厩忠夫进而认为：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除了知识分子，对各种滞留上海以及对日合作者，也不能用“抵抗或合作”的二分法加以简单归类，必须承认存在着多种“灰色地带”。包括战时上海在内，占领地区、殖民地的“灰色地带”概念，可谓是抵抗与合作之间的中间选项，在多数情况下，被视为利己主义与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典型。要而言之，在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控制下，确保自我认同变得极其困难，而每日的生存成了极为紧迫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地的精英阶层与民众而言，“灰色地带”是一种自主、积极的选择。⁹而对于多数战时上海文化人而言，真正置身“灰色地带”之中，游离于“抵抗”或“合作”之外，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日伪当局将文化事业作为推行其政策的工具，因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实行严格的管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界定“灰色地带”的范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争议。抗战胜利后一些文化人的遭际，就说明了这一点。进而言之，战时上海文化人在“灰色地带”中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可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控制下生存状态的缩影。

⁹ 翻译自「まえがき」、『戦時上海のメディア—文化的ポリティクスの視座から』、高岡博文、石川照子、竹松良明、大桥毅彦编、研文出版2016年版。